

W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胡 绳/主编

社会资本论

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

张其仔/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社会资本论

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

● 张其仔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 / 张其仔著 . - 2 版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999.9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ISBN 7 - 80050 - 913 - 3

I . 社 … II . 张 … III . 资本 - 关系 - 经济增长 - 研究
IV . F0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9211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

社会资本论

—— 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



著 者：张其仔

责任编辑：王 静

责任校对：同 文

责任印制：盖永东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12

字 数：311 千字

版 次：1999 年 9 月第 2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 - 5000

ISBN 7 - 80050 - 913 - 3/C·84 定价：20.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总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一支朝气蓬勃的青年研究队伍，他们多是毕业于本院研究生院和全国许多著名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有的曾出国求学。他们接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基础知识扎实，目光敏锐，视野开阔。目前，在经济学、哲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国际问题、文学、语言学、史学等主要学科领域，正在有越来越多的青年研究人员承担起重要的研究工作。他们中间有的已经崭露头角，有的已经成为博士生导师、学术带头人，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机遇，同时，研究事业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新问题。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困难就是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是通过论著的形式作用于社会，出版问题得不到解决，研究成果就难以产生其应有的社会效应，研究人员的劳动价值也就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目前，学术著作出版难已经成了一个困扰研究人员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名家的著作尚且难出版，青年人的就更难了，对青年科研人员来说，学术成果能否被社会所接受比物质生活待遇好坏似乎更为重要。因此，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科研队伍的稳定和研究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科学院仍然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学者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致力于学科建设和研究事业，在比较艰苦的科研环境和条件下不断做出成绩，这是令人钦佩和感人至深的。从他们身上，不仅能看到可贵的爱国情操和献身事业的精

2 社会资本论

神，还能看到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乃至社会主义中国的希望。有这样的精神风貌，相信他们必将能够成为跨世纪的栋梁之才。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既是基于学术研究事业的考虑，也是为了实实在在地帮助青年学者，解决他们学术成果出版难的问题。通过丛书的编辑出版，一方面让青年学者辛勤所得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另一方面让他们的成果接受社会和实践的检验和学界的评判，以利于提高他们的水平，促使他们尽快成才。繁荣学术，扶植青年，我想这是编辑《文库》的两个最重要的宗旨吧。

至于《文库》能不能起到这个作用，有没有好的社会效益，就取决于大家的努力和合作了。若干年后再来看这件事情，也许就清楚了。

胡 绳

一九九四年一月三十日

从学术角度而言，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研究，是当代国际学术界的前沿问题之一，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都对它进行了广泛研究，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命题。张其仔同志选择这一课题，从立论上体现出同国际前沿研究接轨的取向。

在理论上，张其仔同志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批判，从社会学的立场提出了“社会人”假定。将社会学中的网络分析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引进对经济行为的考察，科学地界定了“社会资本”的概念。

在经验层面上，张其仔同志运用“社会资本”概念以解释中国独特的资本积累方式，产权制度以及对技术的作用，都很有创意，在将这一理论系统化的基础上，向同中国实际结合，向实际运用前进了一步。

——陆学艺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

本书的贡献在于将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上升为一般规律，并进而上升为社会学范畴，从而丰富了应用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回答了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社会问题。同时，运用掌握的社会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对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进行深度开发与系统运用，使之科学化，又反过来给实证研究以新的理论与方法，使实证研究进一步深化。

——张厚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任	胡 绳			
副主任	汝 信			
编 委	王仁湘	王逸舟	王缉思	白 钢
	刘欣如	汪同三	沈家煊	李 扬
	李培林	陈佳贵	张晓山	张蕴岭
	杨 义	郑成思	卓新平	赵一凡
	郝时远	彭 卫	景天魁	
执行编委	王 正	刘白驹	刘迎秋	朱渊寿
	何秉孟	李正乐	杜晓山	周志宽
	周明俊	金 泓	章绍武	黄浩涛
	黄燕生	谢寿光	蔡文兰	
秘 书 长	蔡文兰			
副秘书长	朱渊寿	黄燕生		

出版说明

一、本丛书选收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的优秀学术理论著作，旨在扶植青年，繁荣学术。

二、选题范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各个学科门类，著作范围不限，惟以学术水平和社会效益为标准。

三、国家重点课题、中华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青年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及青年科研基金课题的成果是本丛书选收的重点。

四、入选著作的作者年龄均不超过 39 岁。

五、本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序

各国学术界都倾向于认为社会学产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的法国。在社会学史上最先对社会学的对象、方法和理论提出基本构想的是孔德。中国的社会学是从西方引进的。1902 年章太炎翻译了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几乎就在同时，严复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译成《群学肄言》，此后不久又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人们通常认为这是社会学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标志。就像任何外来的社会科学都要经历几个基本阶段，社会学同样要经历三个阶段方能走向成熟，并成为我们国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早期的中国社会学以翻译介绍英、美等诸国的社会学著作为主，是社会学的引入时期，主要以学习为主。一批先后在国外学成归来的知识分子，如陈达、李景汉、吴文藻、吴泽霖、吴景超、许德珩、陈翰笙、孙本文、费孝通、雷洁琼、杨堃等人，为社会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到本世纪 50 年代初，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高等学校停止讲授社会学，一直到 1979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社会学才在中国得以重建。由于中断了 20 多年，对西方社会学的进展国内了解甚少，也缺乏一支基本的骨干队伍，重建社会学以后引进、传播西方社会学仍是我国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任务。

对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吸收都不可避免地要把它应用到对现实生活的分析研究上去。我国社会学的引进最早就具有吸收西方社会人文思想以达到改良中国的目的。但把社会学知识应用于研究中国现实，早期多是由外籍教师主持下的小范围调查，如

1918~1919年燕京大学教授步济时与美籍传教士S.D.甘博对北京社会状况的调查。到30~40年代，中国自己一批知识分子在传播社会学知识的同时，开展了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如李景汉的河北定县调查、费孝通的“云南三村”调查等都是应用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研究中国社会生活的典范之作。1979年社会学重建后，社会学界继续秉承了实用性格，在吸收、引入西方社会学知识的同时对中国社会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如费孝通主持的中国小城镇调查、雷洁琼指导的5城市家庭调查、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参与指导的中国百县市调查等，都具有很高的实际应用价值。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产生都要受到它赖以产生、成长的社会现实生活的影响，并构成为社会现实的一部分，但当它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家或另一种社会环境，并逐渐与之相接触、相碰撞的时候，逐渐会产生理论的反思，这门学科的一些原理、范畴、概念乃至于方法都不能给新的现实以合理的解释。所以，社会学传入我国并被逐渐深入地应用于日常生活和实践，社会学自然而然地将由第二个阶段转入第三个阶段：在新的现实上构造理论、发展理论。港台地区的学者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开始了对社会学的反省，尝试着社会学的本土化。大陆学者虽然多少受到了港台地区学者的影响，但主要是感受到社会变迁、社会实践的需要，要努力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所以，大陆社会学者在重建社会学后不久，就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任务，现在这种潮流正日益强大起来，而且必将取得很大成就，对国际社会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张其仔博士的著作《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就是这种潮流中的产物，是建立在社会学界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代表了作者在理论方面顽强探索的努力，是国内第一本系统论述社会资本的著作，具有开创性。它从中国人重视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具有网络特性的角度出发，对经济人假定作了深刻

的批判，并建立了结构行动理论，为学术界长期争议的韦伯命题和反韦伯命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对中国文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观点，更加重要的是作者在方法论上的探索和努力。

社会学在方法论上一直存在着争论。一方面，有部分人主张可以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如孔德就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并无本质区别，都可以用普遍的因果律加以说明，这就是社会研究的实证主义。这个方法在很长时期成了社会研究的主流。与这种方法对立的是非实证主义。早在实证主义之风日盛的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就受到了批判。N. 文德尔班和 H. 李凯尔特要求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之间作出泾渭分明的分界：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发展的一般规律，文化科学是一种表意性科学。狄尔泰把社会科学界定为只能描述、记录人类历史的特殊事件，反对在社会科学领域探索规律的自然科学化倾向。本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论者引用维特根斯坦在语言哲学上的论点解释社会科学的本质。温奇（Peter Winch）甚至大胆地指出，社会研究不属于经验科学范畴，而类似哲学般，着重于概念上的分析。当然真正能取得与实证主义相抗衡地位的非实证主义理论是出现于欧洲大陆的批判理论和诠释学。它们同样强调社会现象是由文化意义和价值构成。批判理论强调社会研究工作中研究者要自觉地加入价值判断，诠释学则强调双向的理解。由此，无论是批判理论还是诠释学都反对建立普遍的因果规律。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社会学经过长期的发展，依然没有找到像自然科学一样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非实证主义思潮特别是批判理论和诠释学的兴起，实证主义似乎已经成了贬义词。尽管非实证主义在哲学的基础上给实证主义以打击，但专注经验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一般不大关注有关社会科学本质上的争论，用自然科学模式研究社会现象实际上仍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很少有社会理论者信守实证主义，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模式仍占主流地位。

张其仔博士虽然并没有就社会学的本质展开说明，但他的著作似乎表明了他的立场是要建立一个用以描述因果规律的模型。他赞成为人的目的理性假定，同时，把社会学家用于经验研究的实证主义模式引入理论的构建上，试图用一种数学语言描述人类的行动。这是一种智力上辛苦而又很有必要的探索性工作，无疑代表着作者要建立一种规范社会学的努力。我以为，这种努力是发展社会学的重要方向之一，寻找事物或社会现象的因果规律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虽然不是唯一方法和唯一方向。解释论和批判论的方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我不赞成现在过分贬低实证主义的倾向。我们不能以一种方法贬斥另一种方法，因为社会十分复杂，每一种方法都能为理解社会提供一把钥匙。对一种方法的认同并不代表着一种方法上的优势。一种方法的适用性完全要决定于研究的具体问题。任何一种方法上的努力都有其价值。相对而言，一种用数学语言加以表述的精美理论具有形式化的魅力。

张其仔博士跟随我多年。他的这本著作从思想的产生到成稿花了8年时间。我希望他的这种努力能够继续下去，也希望他在社会学研究方面尽展其所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为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陆学艺

前　　言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研究社会网络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它力图在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打破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隔，并在此基础上回答下列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新工业革命形成的原因何在？儒家的社会经济理论是什么？

这本书的种子早在 1988 年就埋下了。当时我师从陆学艺教授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问题。是年，跟他去某县作调查，有一次午餐，大家讨论起当时就极流行的“吃”、“喝”风问题，得出的结论使我很是吃惊：基层的领导就怕没有人去吃饭。一百个人吃饭，只要拉上一个人的关系，开销就能赚回来，且有所增殖。威廉·配第说过，土地是财富之父，劳动是财富之母，但我当时意识到的是社会关系也能给人带来财富，可能是财富的“继父母”。这个观念在我日后的调查中得到证实并被我的日常生活经验所强化。但把社会网络作为一种同企业、市场相伴列的配置资源体制的思想是迟到 1994 年下半年才形成。这主要得益于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有关研究。

人类学和社会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原始经济和乡民经济镶嵌于社会结构中的事实，注意到了社会网络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并把它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林耀华教授在他的《金翼》中写道：

我们的生活可以冷静客观地用图表说明。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像一个由用有弹性的橡皮紧紧连在一起的竹杆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出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杆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每一个人，如

抽出一根竹杆，我们就会痛苦地跌倒，整个网便立刻松弛^①。

经济学对社会网络的研究较人类学、社会学为晚。系统的研究起始于凡勃伦（Verblen）、康芒斯（John R. Commons）创立的制度经济学。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出版于1934年，是旧制度经济学的重要著作。它所研究的就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影响。制度经济学目前已有很大发展，进入了新制度经济学时期。尽管在制度经济学的旗帜下已经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著名经济学家的名单，但制度经济学依然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行列。

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已经形成为一种高度精致化的完美体系，代表20世纪人类智慧的最高成就之一，具有很强的审美力量和逻辑结构上的强制力。与此相反，制度经济学严格说起来还不能归入“科学”的行列，它不但没有建立严格的逻辑结构，而且在数学化的程度上甚至还只是刚刚起步。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之间至今还缺乏合理的接口。

仅从视角上看，制度经济学属于经济社会学。因此，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建立一个接口，实现综合的困难同时预示着经济学和社会学统一和综合的困难。就像进入任何一个新领域都要冒失败的风险一样，把社会网络引入经济学中，把经济学的方法引入社会学中，以期打破经济学和社会学界限的努力，极有可能是一朵永远不结果实的花朵，但在一片未曾开垦的土地上，不懈的努力的报偿可能十分丰厚。

这本书结合了经济学、社会学乃至人类学的有关研究成果：一方面它把社会网络视为一种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把社会网络视为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它将力图建立一个分析社会网络的规范体系。在大量的有关社会网络的研究中，我思想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下列著作：科尔曼的（James S Coleman）《社会理论的基础》，布劳（Peter M. Blau）的《社会

^① 林耀华：《金翼》，第2页，三联书店，1989。

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开普楼（Theodore Caplow）的《权力的游戏——人际关系中的二对一》，斯梅尔瑟（Neil Smelser）的《经济社会学》，瓦尔拉斯（Leon Walras）的《纯粹经济学要义》，科斯（R. Coase）等著的《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威尔伯和詹姆斯（Charles K. Wilber 和 Kenneth P. Jameson）合著的《经济学的贫困》，威廉姆斯教授（Oliver E. Williamson）于1987年5月25日～6月13日在北京所作的《交易费用经济学讲座》和两位李奇（Jeny Leach、Edmond Leach）编著的《库拉》（The Kula）。此外，我还从很多作者的著作中吸收了思想，它们将在文后的参考文献中列出。

这本著作无疑凝聚着我的授业恩师陆学艺教授的大量心血。没有他的辛勤指导和热情鼓励，我是不可能完成这篇论文的。对于陆学艺恩师，我无论如何表达感激之情都难言其万一。

我还须感激李培林研究员和黄平博士。李培林现在已经升任副所长。此前他曾为工业室主任（入学时，被指定为我的第二导师）。在和他共同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我获益匪浅，同时他阅读了论文初稿，对我的论文写作提过有益的建议。黄平博士曾推荐我读杜赞奇博士的《权力、文化与国家》一书。他的推荐使我细读了此书，并有入宝山之感。

我特别要感谢留日归来的罗红光博士。他不仅为我贡献了有关社会交换的宝贵文献，而且他的丰富的人类学知识，使我获益匪浅。

张厚义研究员不仅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提供了很多帮助，而且在百忙之中审阅了初稿，并提出修改意见，在此，我深表谢意。

我衷心地感谢参加我论文答辩的苏国勋研究员、杨善华和林彬副教授，他们对我论文的评析，使我更进一步地思考论文的主题和证明的方法，这无疑帮助了我日后论文的修改和进一步的合理化，对本书的完善起了很大作用。

院科研局的宋家鼎老师对青年学者一直备爱有加。我的论文

完成之后，他就一直鼓励我把它修正成书。没有他的关怀和鼓励，我只怕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论文修改的任务完成。在此，我对宋家鼎老师的热情关怀和鼓励表示衷心感谢。

马援同志是我同行，他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心血，为著作增色不少，特致谢忱。

毫无疑问，我不得不对文献出版社的王静编辑深表感谢，她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编辑素质，保证了本书的出版质量。

由于本人学识有限，社会资本的研究又是个新课题，本书难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诚恳地希望读者和学界的同行提出批评指正。

张其仔

1995年12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号楼

再版前言

和第一版相比，再版主要增加了社会资本的测量和社会资本再生产方面的内容。1995年完成《社会资本论》第一稿后，我就为它没有社会资本的测量和再生产部分深感不安，但在当时，觉得写作这两部分，有些力不从心。1995年后，我把自己对社会资本研究的重点放在这两个方面，经过几年的辛苦，有了一些进展，这一版增加的主要部分，就是这几年的初步研究成果。

此外，我还对原来的个别提法作了修改，在不影响基本意思的前提下删掉了部分和研究主题关系不甚密切的案例和数字；与此同时，为了把有些问题阐述得更清楚些，增加了一些新的素材。这些改动，由于涉及多处地方，这里就不一一列出。

在本书再版之时，我不得不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谢曙光社长表示衷心感谢，没有他的支持，拙作未必有再版之日。作为一位资深编辑，他眼光敏锐，魄力非凡，令我辈莘莘学子，深为折服。

我不得不再次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王静，没有她的支持，我就不会修订拙作。

我虽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由于本人才疏学浅，不足之处难免，敬请读者和学界同仁不吝赐教，我当感激不尽。

张其仔
1998年10月于大北窑陋室